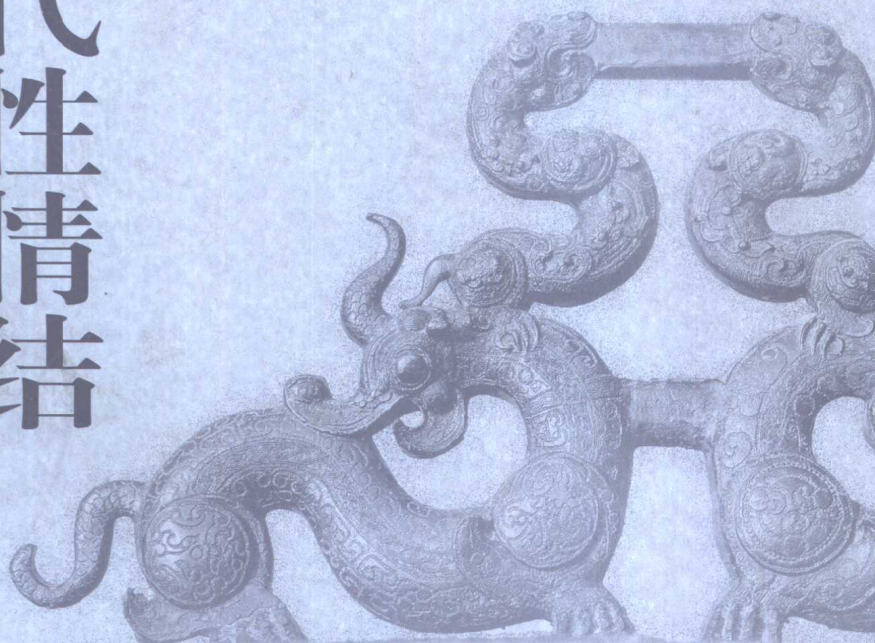


新时期文艺学建设丛书

钱中文
童庆炳 主编

汉语形象与现代性情结

◆ 王一川 ◆ 著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新时期文艺学建设丛书

汉语形象与现代性情结

王一川 著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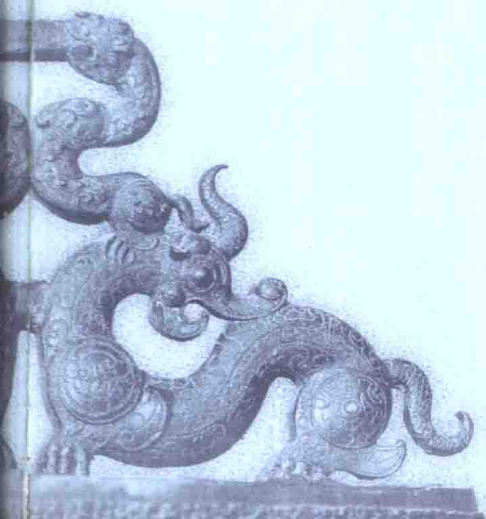
新时期文艺学建设丛书

钱中文
童庆炳 主编

汉语形象与现代性情结

◆ 王一川 ◆ 著

H E C O N G S H U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汉语形象与现代性情结/王一川著. -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10

(新时期文艺学建设丛书/钱中文, 童庆炳主编)

ISBN 7-81064-282-0

I. 汉… II. 王… III. 汉语-文艺学: 美学 IV. I 0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46925 号

新时期文艺学建设丛书

汉语形象与现代性情结

王一川 著

责任编辑 吴 君

封面设计 李 梅

责任印制 胡晓旭

责任校对 王京丽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三环北路 105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E-mail cnup @ mail.cnu.edu.cn

网址 www.cnup.cnu.edu.cn

电传 68418523 (总编室) 68472512 (发行部)

北京嘉实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版次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200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10.25

字数 271 千

印数 0,001~3,000 册

定价 18.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作者近照

总 序

20 世纪的我国文学理论，经历了曲折发展的道路。一般认为，世纪之初几十年与世纪之末的几十年，是我国文学理论发展的较好时光，自然，三四十年代也是出现一些重要的文学理论著作的时期。

世纪之初，我国文学理论的发展势头原是很有希望的。梁启超标榜诗界革命、小说革命，把文学与当时救国救民的任务结合起来，也是国情使然。而王国维在 19 世纪德国哲学的影响下，摆脱了我国几千年的政教文学观，主张文艺为人生，提出文学的独立性与自主性问题，这较之稍后的美国与俄国的形式主义者的文学自主性理论，在论说上既早且要深入得多。但是，文学理论发展的趋势，并不是完全以个人的学识、审美趣味为依归的。

自 20 年代开始，随着我国社会斗争的形势的变化，从苏联、日本介绍过来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并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马克思主义文学观使人们了解了文学与社会、文学与生活与文学与时代的关系，以及文学具有阶级性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从根本上改造了我国的文学理论，力图使我国的文学理论走上科学化的道路。

50 年代，由于形势、环境的复杂原因，出现了独尊一家、废黜百家的现象，于是随之而来的是文学理论的急剧的政治化倾向、庸俗化倾向，这一过程使文学理论批评成了纯粹的政策、政治功利手段。到 70 年代末，文学理论界几乎是一片荒芜、败落景象。当然这期间并不是没有精当之论、深微之论，但都被淹没于政治口号之中，更有甚者则遭到无情的批判。

70年代末,我国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一个文化转型期,文学理论终于出现了转机。随后,文学理论界在改革、开放的思想引导下,大规模地介绍了外国文论,引进了百年来的各种西方文艺思想。短短十来年间,人们兴致勃勃地模仿、宣传、实验,几乎把百年来的各种欧美文艺思潮操演了一遍,文艺思想空前活跃。

在这种外来文艺思想如潮水般涌来的情况下,人们要保持心态的完全平衡是不大可能的,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在思维方式上,都无不受到触动。看到外国文论发展的趋势以及我国文论难以为继的状态,自然会产生求新求变的渴望。这时也有人或把外国文论看为现代文论的范式、我国文论的出路所在;这是因为隔阂既久,所以难免眼花缭乱,心态浮躁,也往往会浅尝辄止,囫圇吞枣;或抱着拒斥的态度,把外国文论视为资产阶级文艺思潮的泛滥,内心惶惶,实有朝不保夕之感,其实这也是大变动时期的正常现象。80年代中期,文学理论界有关文学主体性的争论的出现,是被我国80年代初哲学中的有关人道主义、人性问题、异化问题的讨论所准备好了的,是为外国文论、外国文学的大量介绍、影响所准备好了的,更是为我国文学创作中新的突破的酝酿所触动的结果。在文学理论问题的争论之中,可以说各种思想竞相展现,几乎人人都认为真理在自己手里,要找个地方,一吐为快,或登高一呼,树立新的旗号,文学理论似乎处于严重的失序状态。实际上,这正在逐渐酝酿着一种在失序中不断完善的新型的有序状态,或者说一种新的理论格局。

文学主张杂语化、多样化的时代来到了。一旦旧有的禁锢被捅开,这时就让人觉得,文学理论中的问题是如此众多,以至任何问题都成了问题,必须进行重新阐释;而文学创作中层出不穷的新问题,也常常使理论与批评无法对创作再发表恳切、精当之论,不能不陷入尴尬境地。一些从事文学理论研究的专业学者,事实上早就思考着、协调着文学创作与理论的关系,希冀建立一种多样化的新的文学理论,这就是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

所谓“中国特色”,一、就是用中国人自己的目光、观点与理解,而非外国人的目光、观点与理解,来阐释中外文学现象。

近百年来，中国人几乎总是跟随在外国人的理论创新之后，翻译介绍，来往奔走，疲于奔命，而这种跟随与模仿，又往往变为一种时髦与招摇。二、就是必须连接六七十年来被忽视甚至中断了的古代文学理论传统，从古代文论中吸取丰富的营养，摄取那些具有生命力的观念，激活那些并未死去的东西，使之成为新的文论的血肉。三、要与当代的中外文学实践相结合，用以阐释我国的与外国的新文学现象，形成我国新的文论。四、有着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又是多种多样的，对精神现象的大一统、单一化的理解一旦破除，文学理论就显出其自身的多姿多彩，加上各种学派的理论竞丽争妍，就会显得更加绚丽斑斓。

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建设，正在进行之中。建成这一文学理论的标志是，在吸收中外古今文论的基础之上，我们在阐释本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现象时，在理论上有自己的一套不断确立着的规范、术语与观念系统，具有我们自己的理论独创之处；在世界文论中，不是总是跟着别人说，而是用我们自己的话语表述，并在世界多元化的文论格局中，有着我们文论的一定地位，使中外文论处于真正的交往、对话之中。开始于 80 年代中期直至今天的文学理论的反思，大体是按照这种认识进行的。

回顾文学理论的进展与更新，我们可以说，这 20 年的光阴并未虚度浪掷。就我们所知，不少学者广泛涉猎中外文学论著，借鉴各种流派研究方法，探讨着文学的不同问题：都曾清理、整合过自己的学术思想，从不同侧面来阐明种种文学现象，以适应新的文学实践与新的文学潮流的需要。

对于 20 年来的文学理论研究成果，我们自然不能盲目乐观，但也不宜妄自菲薄。新时期的文学理论是个很有成绩的部门，只是未加集中、未曾展示而已。文学理论中出现了不少好书和优秀著作，这是事实。

一是它们具有创新意识。创新意识就是能够抓住理论中的关键问题或是新的问题，从新的角度，对它们进行合乎实际的理论阐述，提出新见解、新观点，使理论问题在原有的基础上，获得新的说明，从而使理论有所丰富、有所发现、有所前进。只有创新，才能使文学理论研究具有活力，获得生命。新时期的文学理

论改变了原有的文学理论的面貌，它的理论探索的锋芒射向文学领域的各个方面，它所讨论的不少问题，是过去的文艺学未曾涉及的，因此不时引起思想的火花而新见迭出。自然，作为新的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的整体形态还不够成熟，但是就单本著作水平而言，一些学者是获得了较高的学术成就的。

二是这些著作初步实现了理论观念的多元化。文学本身的问题是可以分为多种层次的，每一层次的问题探讨的角度又是多种多样的。十多年来，有关文学审美、性质、特征、作品、文体、结构、意象、意境、境界、作者、读者、阅读、修辞以及文艺心理学、文学社会学、文学阐释学、接受理论、比较文论与文化诗学等这类问题的探讨，都有专著问世，虽然水平参差不齐，但也不乏精品。

三是研究方法的多样化。文学理论学派进入多元化之后，研究方法自然出现了多样化趋势，而一些学科本身就要求新的方法，如文艺心理学、文学话语研究等，方法的多样化更加促进了理论的多元化。这种景象还是我们在 80 年代初所梦寐以求的。理论的多元化、方法的多样化，可以使理性的智慧获得解放从而排除人类思维的独语现象，可以使学术个性得到尊重，使它们成长，获得生机。多样而巨大的学术个性的出现，是一个时代学术成就的标志，一个没有学术个性的时代，必然是平庸的时代。有了学术个性的出现，才谈得上学派的形成，进而漫向四面八方，推动学术的更新与发展。可以这样说，今天文艺理论中的学术个性正在探索之中与形成之中。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大声疾呼文学理论与方法多元化的原因。

一个理论创新的新世纪已经来临。不过任何一种新型的理论形态的建立与发展，都要以前人提供的“思想资料”为基础。新时期的文论，作为一个良好的开端，它们无疑可以成为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的前期成果；而作为丰富的思想资料，它们无疑将汇入新世纪的新的理论创造之中。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邀请我们编选一套《新时期文艺学建设丛书》，我们十分高兴地接受了这一工作。“丛书”将分辑出版，每辑 6 种。在目前出版条件相当严峻的形势下，出版社毅然组织

这类学术著作的成批出书，这对于已经走过一段时间的新时期的文学理论来说无疑是一个肯定，对于即将来临的新世纪的文学理论建设，更是一种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巨大鼓励；这种气魄与目光，是令我们十分感佩的。

钱中文 童庆炳

1999.9.9

叩探中国现代性诗学

(自序)

自从1988年在牛津经历“语言论震惊”以来^①，尤其是90年代初提出“理论的批评化”和“修辞论美学”等主张以来^②，我一直要求自己拒绝抽象理论大厦的诱惑而返回具体文学批评的原野，去重新寻求文学理论的灵性。如今，回望这些年行走的足迹，我不禁发现，自己是极大地受惠于这条理论的批评化道路的。如果不是它，那我就沉醉在“体验美学”的形而上迷宫里继续徘徊不前，而无法享受到具体文学批评带来的莫大快乐^③。尤其重要的是，正是这条道路把我牵引到了此前并未明确想到的陌生的地方——叩探中国现代性诗学。

确实，回顾我这些年里所思考的东西，可以见出，无论在用语上如何变化，不管是否足够明确，前后左右都离不开中国现代

① 见《语言乌托邦》后记，第394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② 分别见拙文《文艺理论的批评化》（《文艺争鸣》1993年第4期）和《走向修辞论美学》（《天津社会科学》1994年3期）。其实，提出“理论的批评化”这一自我戒律本来是多余的和不必要的，因为，正像人们可能已看到的那样，“理论”与“批评”本就不应分家，本来就是一回事。但是，由于那时我们的理论与批评相互脱节的现代正统实在余威强劲，以致空头理论教条仍在禁锢着自由的创造力，因此，理论的批评化就是一个无奈而又必然的主动选择。

③ 一个有趣的情形是，喜欢“体验美学”的相识或不相识的朋友们，至今见我时仍不忘谈论我的处女作《意义的瞬间生成》（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但却不大愿意评说我后来的《修辞论美学》。就我自己来说，尽管对《意义的瞬间生成》有着缅怀与惋惜，但更愿意通过“修辞论美学”去正视和澄清它的形而上缺陷。

性问题的范围。也就是说,我所关心的不是古典性而是现代性,不是西方现代性而是中国现代性。我用中国现代性这个术语(也可称中国文化现代性),约略地涉及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至今的长时段,指这时期中国社会在生活方式、价值体系、伦理规范、语言模式、心理结构和审美表现等方面所获得的新性质,这些新性质与此前古典性文化相比呈现出许多不同的新面貌。而我的探讨总是指向这类现代性问题。对此,我曾经提出建立“中国现代学”的主张^①,希望能在“中国现代学”名义下专门处理中国的现代性问题。

同时,我对中国现代性问题的思索又与时下从事思想史研究的一些专家不同。他们致力于从现代重要思想家或其他知识分子的活动中考察中国现代性的普遍方面(如政治制度、社会模式、学术规范、教育体制、法律机制等),而我的兴趣则仅仅集中在中国现代性的诗学维度上。这里所谓中国现代性的诗学维度,指的是始终坚持透过文学艺术的审美表现层面而思考中国现代性问题,或者指分析中国现代性问题在审美表现领域的具体风貌。当我觉得中国现代性的普遍方面十分重要但又难以把握时,专注于它的诗学维度就成了我的必然选择。这不是说我宁愿逃遁于诗意世界而忽视更广泛的现实问题,而只是意味着说,在我看来,诗学维度是现代性的一个特殊的而又重要的方面,它以其活生生的审美形象系统,夹带着丰富的文化想象,尤其能显示中国现代性工程的丰富面貌、深层奥秘及其内在痼疾。我能够在这个维度上有所耕耘,其愿足矣,其乐无穷。况且我的专业知识有限,这也决定了我只能从我所熟悉的诗学领域出发,并且再返回这个领域。

这样,连我自己当初也没有明确地意识到,我沿着理论的批评化道路所进行的这些不成熟的摸索,实际上都可以归属到中国现代性问题的诗学研究上,这不妨暂且称做中国现代性诗学吧(如果从稍微宽泛的意义上看又可称中国现代性美学)。中国现代性诗学是对于中国现代性问题的诗学探究,即是始终结合文学现

^① 见拙文:《现代文化研究需要新眼光——中国现代学刍议》,载《文汇报》,1998年5月13日第12版。

象批评而展开的中国现代性问题分析。这种中国现代性诗学的出现，是与来自两方面的压力有关的。一方面，90年代横贯人文学界的现代性研究热潮，要求文学理论走出纯粹审美王国而上升到对中国文化现代性的普遍性审视；而另一方面，文学理论的学科自觉趋向，又要求在思考中国文化现代性问题时始终不离文学现象以及文学理论的学理性建构。一个要寻求跨学科的文化论转向，一个要坚持纯学科的学理性自觉，这两股力量同时挤迫我，形成一股强劲的合力，驱使我走向中国现代性诗学。当然，我自己清楚，这里的中国现代性诗学决不是一种抽象的或形而上的诗学理论，而是一种始终不离具体本文批评的诗学阐释；同时，我目前的研究仍然处在初始状态，有待于今后展开。

本书里的15篇论文，正是我从1996至2000年里陆续发表的此类探讨的部分辑录。它们除少量（仅4篇）外都不见于我已出的著作，但在我这期间的研究中又具有一种代表性。由于此前我已为自己选编过专题论文集《修辞论美学》、10年自选集《通向本文之路》和短论集《杂语沟通》，而近年也出版过专著《中国形象诗学》、《张艺谋神话的终结》和《汉语形象美学引论》，从而在这次选编时注意辑录未收入上述几种书的新论，目的是尽量避免内容重复，以便读者朋友确实能得到我的新近探讨的汇集。所以，本书可以从一个侧面映现出我在这些年来思考中国现代性诗学时的一点心得。

《中国现代学刍议》是我在考虑中国现代文学史时遭遇的理论困惑的一种尝试性解决方式。我希望通过建立“中国现代学”而为中国现代文学阐释提供一个更基本的现代性文化理论平台，这也是我目前正琢磨的“中国现代性诗学”的一种先前雏形。《现代性文学：中国文学的新传统》正是从“中国现代学”思路去透视晚清以来至今所谓近代、现代和当代文学的结果，提出了“中国现代性文学”这一新概念。《从诗意启蒙到异趣沟通》描述中国审美精神从80年代到90年代的演变状况，“异趣沟通”代表了我对新的审美精神的呼唤。

《倾听跨体文学潮》对于20世纪末以“跨体文学”为代表的文学文体变革作了初步分析。《近五十年文学语言状况》粗略地

勾勒了 20 世纪后期中国文学语言的演变线索。《汉语形象及其基本地位》和《汉语形象与文化现代性问题》出自《汉语形象美学引论》一书，可以约略显示我对于“汉语形象”及其基本地位以及它对于中国现代性文学和文化现代性的意义的思索。《现代性情结与文化无意识》对 80 年代以来家喻户晓的“走向世界”口号作了修辞论阐释，指出其隐藏的现代性情结和文化无意识渊源。《中国现代文学的杂体互渗时段》和《文化虚根时段的想象性认同》都是最近刚刚完成并在学术会议宣读的论文，前者是对 90 年代中国文学（包括文学理论）状况的新观察；后者则是我近年来思考金庸的一个临时性结果，大致可以反映我关于金庸小说的价值和地位的阐释框架的轮廓（有待于进一步调整和完善）。《跨体小说——世纪末小说文体革命》和《借西造奇》同是对中国当代先锋小说的探索，前者对不大为人注意却又十分重要的作家刘恪的“跨体小说”作了阐释，收录在此或许可以引起对这位近十年来最富独创性的先锋小说家的更多关注；《借西造奇》主要回溯 80 年代后期先锋小说的语言形象。《整体文化、民俗文化与修辞论诗学》和《旧体文学传统的现代性生成》分别是我学习钟敬文先生和启功先生的论著的初浅心得。钟老从“整体文化”及“民俗文化”视野对中国现代诗学（文学理论）的重要建树，启老对旧体诗的现代性变革及有关汉语修辞的作用的卓越思考，都值得珍视。

由于这些论文多与“汉语形象”（语言）和“现代性”问题相关，因此取名《汉语形象与现代性情结》。

本书为教育部资助优秀年轻教师基金 1998 年度项目“传统与现代——20 世纪中国文艺的审美特征”研究成果，特此向杨春茂先生、张健教授和陈传才教授致以衷心的感谢。

我要特别感谢钱中文先生和童庆炳先生，承蒙两位主编的厚爱 and 提携，本书得以忝列《新时期文艺学建设丛书》中。我还要感谢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领导及编辑，他们以辛勤的工作确保本书顺利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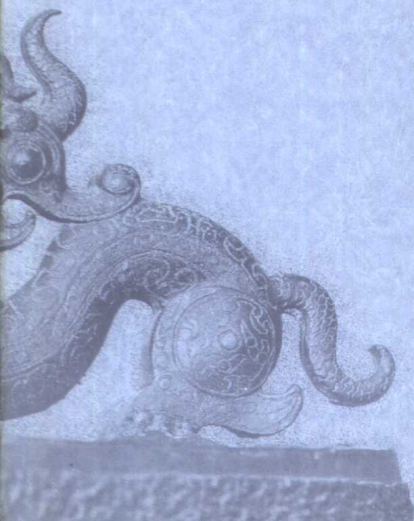
王一川

2000 年 11 月 15 日

新时期文艺学建设丛书

主 编

◆ 钱 中 文
◆ 童 庆 炳



◆
封面设计

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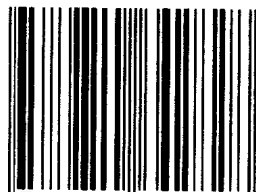
梅

◆
责任编辑

吴

君

ISBN 7-81064-28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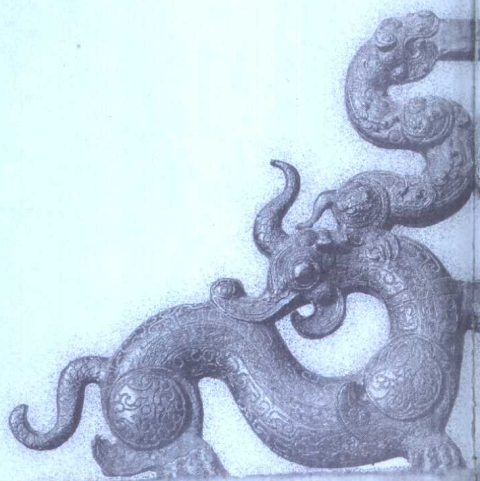
9 787810 642828 >

ISBN 7 - 81064 - 282 - 0/B · 31

定价：18.00 元

X I N S H I Q I W E N Y I X U E J I A N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tbook.org.com